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赓续中华文脉
厚植城市文化软实力

朱继东 李建鑫

2025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提出：“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完善城市风貌管理制度，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明确了新时代城市工作的一项重要重点任务，更深刻阐明了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对于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意义。

城市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软实力概念在城市领域的具体化运用，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对外塑造城市形象、对内凝聚城市文化共识的功能效用。而中华文脉是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动态传承的生命线，蕴含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中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资源、精神文化标识及核心价值共识，不仅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稳固和高扬注入文化基因，更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厚植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故此，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剖析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深层逻辑关系，为新时代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深刻的理论启迪与实践指引。

中华文脉传承中蕴含的标识性文化符号，塑造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身份标识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首要特征体现为对城市身份的认同性。当城市所彰显的文化能够使人产生对城市本身的认同与共鸣时，其文化的吸引力就会自然产生，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孕育、形成的标识性文化符号便构成城市身份认同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中华文脉中蕴含的标识性文化符号作为一种具象化的文化表达，是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岁月沉淀凝结而成的独特精神结晶，构成了中华民族及其地区文化的外在标识。而中国城市作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容器和物质呈现，其身份标识绝不仅仅是脱离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基础建设，而更多体现于与中华文脉并序发展而来的、从中华文脉中蕴含的独特标识性符号中提炼出来的文化身份。“北京中轴线”不仅以物理空间的布局成为北京的独特身份标识，更体现着中华文明“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理想和对社会安定有序的极致追求；谈及“姑苏水巷”不仅会想起以水系造就城市风貌的苏州，更会联想到诗意栖居的江南文化。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中所孕育的标识性文化符号与城市文化软实力交互作用，并最终统一于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构，使中国城市有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显著身份标识。

忽视城市对文化身份标识的稳固和发展，而盲

目追求西方的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就会背离城市内涵式发展的主线、切断城市的文脉传承，继而难以形成强大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硬实力的较量，文化软实力的比拼更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塑造鲜明的身份标识是增强城市文化吸引力的关键举措，这也就要求新时代提升中国的城市文化软实力，必须更进一步发挥中华文脉中标识性文化符号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塑造作用。对此，一是要基于学术理论研究，田野调查等形式深入挖掘城市蕴含的文化符号的深刻内涵，以文化符号精神内核的阐释厚植城市的文化底蕴。二是要推动文化符号在多媒体平台、文创产品等领域的创新转化，使传统文化符号在与现代社会的融合发展中焕发新生机。三是要促进传统标识性文化符号与城市品牌形象建设的深度融合，以独特的文化符号为核心打造具有鲜明城市特色的形象标识，充分提升城市的辨识度、知名度。

中华文脉传承中生成的价值观念，凝练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内核

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持久力源于价值层面的认同，中华文脉赓续传承中所形成的独特价值取向，凝练成为中国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内核并使城市的文化吸引力具有持续性。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的历史进程中生成了“仁义礼智信”“开放包容”“天人合一”等传统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以其突出的跨时代性为城市文化软实力提供持续性的价值支撑，并使城市在价值的传递中提升吸引力、获得来自市民与外部的认同。作为孔子故里的曲阜将孔府、孔庙等历史古迹以及祭孔大典、国际孔子文化节等文化活动所承载的“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念融入城市日常生活，形成曲阜的鲜明价值名片，成为曲阜城市发展的价值内核；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遗千年的“东方第一大港”，不仅是古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更在与西方的交流互鉴中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造就了历史上“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盛景，使“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成为泉州的靓丽品牌发展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中华文脉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赓续传承中，能够凝练成为中国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内核。这种价值内核并非外来的价值观念，而是根植于中华文化基因的内生性价值，因此更具持久性、说服力和认同度。

充分发挥传统价值观念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精神内核的塑造作用，一方面必须以“第二个结合”为根本方法指导，在结合中摒弃传统价值观念中的思想糟粕，推动实现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转化、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的相互融通，将中华文脉中的价值观念、思想精华有机融入城市人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要发挥文化创作对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效用，通过

文学、音乐、影视等艺术形式弘扬城市价值内核，生动展示传统价值观念在新时代城市发展中的呈现及其意义。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在传承与革新中进一步融入并引导城市发展规划及城市文明建设，进一步激发市民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认同，进一步激活城市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印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中华文化生命力和中国城市发展活力。

中华文脉承载的历史文化遗迹，构成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物质载体

历史文化遗迹是中华文脉赓续传承的物质见证，古建筑、考古遗迹、文化古迹等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物质实录、构成了中国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坚实物质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从本质上讲，历史文化遗迹是中华文脉在赓续传承的特定时空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凝结，它使城市文化软实力从看似虚无的文化概念落地为可触、可感知的物质文化体验，使市民对城市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有了具体的物质依托。2003年9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西湖文化在杭州文化中有着独特的位置。”杭州的西湖文化并非单纯的古迹，它不仅留存着吴越文化、南宋文化、明清文化的深刻印记，而且在传承和发展中以物质形态的文化穿越特定的时间，塑造成为杭州的文化软实力名片。与此同时，作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物质载体的历史文化遗迹也并非被动的文化承载，它不仅在现代手段的系统保护中实现了自身的存续，而且在现代传播方式的加持下成为可传播的、具有文化影响力的物质文化，使历史文化遗迹由历史遗存变成现实存在，并成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物质文化支撑。

历史文化遗迹绝非静态的物质文化陈列，而是动态的、有生命的物质形态文化，只有进一步将物质载体的历史文化遗迹“活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物质文化，才能够激发作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物质载体的历史文化遗迹的文化功能，实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首先，要在确保历史文化遗迹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前提下，合理开发、科学利用遗迹，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其次，要继续推进“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通过考古研究、历史考证，进一步揭示遗迹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在厚植城市文化底蕴中实现“探源”与“传承”的辩证统一。最后，要将历史文化遗迹与现代公共空间相融合，通过打造特色文化街区、公园等，在尊重历史传统的前提下更好地满足当代城市居民对物质形态文化的需求，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中，让历史文化遗迹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感染力。

（作者分别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

陆叶红 夏云峰



思想经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承载着深邃的思想智慧与丰富的道德资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对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背景下，从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等精神特质中，探索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路径，对于我省思政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课程创新：构建湖湘文化与思政教育的深度耦合体系。课程创新是湖湘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核心环节，其关键在于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而非简单的内容叠加。这种耦合需要建立在对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与思政教育目标的精准把握之上。一是“心忧天下”与家国情怀课程模块的融合。从理论逻辑而言，“心忧天下”所蕴含的家国情怀，与思政教育中爱国主义教育的诉求高度一致。屈原投江明志、左宗棠收复新疆等历史典故，生动诠释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应在思政课中设置湖湘文化专题模块，实现传统与当代阐释的深度对话。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可协同各学科开发跨领域的课程模块。如从历史学视角，深入解读湖湘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实践传统；运用社会学分析方法，探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当代社区治理中的转化与应用；透过对文学经典的细致研读，挖掘《离骚》《岳阳楼记》等作品中蕴含的伦理智慧等。二是“经世致用”与实践教学体系的重构。经世致用的实践理念，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唯一标准”一脉相承。三是“敢为人先”与创新创业课程的开发。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与新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相契合。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启蒙、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变法勇气，展现了湖湘文化中突破桎梏的创新基因。在《形势与政策》课程中，可围绕“湖湘创新精神与科技自立自强”主题，邀请科技工作者开展专题讲座，将历史上的创新壮举与当代科技成就相衔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科技赋能：打造湖湘文化思政教育的数字化传播矩阵。在数字化时代，科技赋能为湖湘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提供了新的传播范式，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增强文化感染力，实现从单向灌输到沉浸式体验的转变。一是沉浸式技术再现历史情境。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构建“具身认知”环境，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学生获得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如让学生通过VR设备“参与”青年毛泽东游学调研，在虚拟情境中体验社会调查方法；构建“伦理决策模拟实验室”，基于王夫之“理势合一”哲学理念设计认知情境，运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伦理判断逻辑，提升实践育人的精准性等。二是智能学习平台拓宽学习路径。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碎片化学习提供了可能。开发“湖湘文化思政教育”App，构建“内容推送—互动讨论—实践打卡”的闭环系统。App可根据学生专业特点推送湖湘文化相关内容，如给理工科学生推送“万步炎与海牛”的故事，给文科生推送“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文化”。互动板块设置“我眼中的湖湘精神”话题讨论，由思政教师引导学生结合专业思考文化传承的路径。三是虚实空间拓展实践场域。虚拟空间的沉浸式体验和互动学习，与实体空间的实践基地和校馆联动相

结合，探索虚实融合的创新实践模式，能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践行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提升高校思政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评估体系：建立湖湘文化融入效果的动态监测机制。科学的评估体系是湖湘文化融入思政教育的重要保障，其重点在于构建多维度、动态化的监测机制，实现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有机统一。从评估内容来看，建立“认知—情感—行为”三维评价模型。在认知层面，通过闭卷考试考查学生对湖湘文化基本事实、核心精神的掌握程度；在情感层面，采用量表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评估学生对湖湘文化的认同感；在行为层面，重点监测学生参与湖湘文化相关实践活动的表现，如是否参与社区文化服务、是否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等。从评估方法来看，引入多元主体评价机制。除思政课教师的主导评价外，可邀请岳麓书院研究员、地方文化学者等作为校外评估员，从文化传承的专业角度进行评价；同时，通过小组互评、个人自评等方式，激发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这种多元评价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单一评价的局限性，更全面地反映教育效果。从反馈机制来看，建立“评估—改进—再评估”的闭环系统。定期对评估数据进行分析，找出湖湘文化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学生对某一文化模块的理解存在偏差、某类实践活动的参与度较低等，据此调整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不断对相关课程进行优化，使湖湘文化融入的针对性不断提升。

（作者分别系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中共邵阳市党校讲师。本文为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华传统美德在高职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与研究”（XJK24CDY010）阶段性成果）

消费视角下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钟辉勇 彭冲

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中国城市发展擘画了新蓝图，其强调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过去数十年间，以“土地财政和大规模增量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化模式，在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当前，发展的指针正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人为本、存量提质增效”的内涵式提升。这引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当依赖土地这一有限物理资产进行开发的增长路径难以以为继时，我们应如何寻找新的价值源泉，以更好驱动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

对“消费”的重新认识，有助于发现并释放其对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强大的赋能效应。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消费常被视为生产链条的终点与财富的单向消耗，其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被系统性低估了。而在现代城市中，消费活动本身具有强大的生产赋能效应，不再是经济循环的终点，而是能够促进创新、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经济活力，并最终驱动增长的起点。

一、消费的生产性是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消费的生产性”摒弃了将生产与消费截然二分的静态观念，揭示了在现代城市中，消费活动本身就on能够直接或间接促进生产、提升效率、创造新的生产能力。其背后逻辑是，现代消费并非简单的物质消耗，而是通过五大机制，系统性地为经济增长赋能。

1. 消费服务外包的生产性：优化社会分工，提升人力资本效率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节奏加快，家庭倾向于将烹饪、清洁、育儿、养老等内部生产活动外包给市场化的专业机构。这不仅直接催生并壮大了家政、托幼、社区食堂等规模庞大的生活服务产业，更重要的作用是，它将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从繁重且重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些被“置换”出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可以被投入到个人教育、职业发展或更高附加值的社會化生产中。这是对全社会人力资本的优化再配置，直接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形成了“更高收入—更多外包—更优发展”的良性循环。

2. 消费结构升级的生产性：定义市场方向，倒逼产业创新

当居民的消费需求从满足基本生存的“有没有”，全面转向追求个性化、品质化、绿色化的“好不好”时，这种来自亿万消费者“用脚投票”的需求侧力量，便成为推动产业创新的强大引擎。例如，对智能家居安全便捷的向往，会直接倒逼芯片设计、软件开发到家电制造的全链条技术攻坚；对健康有机食品的青睐，会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更深层次看，居民在教育、医疗、知识付费等领域的消费，其本质是对自身和下一代人力资本的直接投资，这种投资是形成一个国家长期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基石。

3. “第三空间”的生产性：催化知识溢出，孕育创新生态

“第三空间”是指咖啡馆、城市书房、共享办公、买手店等介于家庭（第一空间）和工作场所（第二空间）之间的非正式公共社交场所。这些场所超越了单纯的消费功能，成为知识交流和创意碰撞的物理“催化剂”。与严肃、封闭的正式会议不同，在这些舒适、开放、包容的环境中，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人们进行着轻松、平等的非正式交流。这种交流极大地促进了“隐性知识”（即无法通过书本言传的经验与直觉）的传播，能够有效激发意想不到的创新火花，是新企业和新合作模式诞生最理想的“培养皿”，构成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最具活力的毛细血管。

4. 空间品质的生产性：吸引核心人才，积蓄城市势能

“空间品质”是指一个地区不可贸易的本地消费便利设施（如特色餐饮、文化展演、体育场馆、城市公园等）的数量、质量、多样性与可及性。在以知识和人才为核心驱动力的现代经济中，高品质的空间是城市吸引和留住高技能创新人才的终极“磁石”。顶尖人才不再仅仅为高薪所动，他们愈发看重一个城市能否提供丰富、有趣、便利的生活体验。人才因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聚集，进而通过知识溢出、技术合作和创业活动，系统性提升整个城市的创新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因此，投资于空间品质，就是投资于城市最

核心的资产——人，是为城市未来发展积蓄最宝贵的势能。

5. 新型消费模式的生产性：释放数据价值，重构生产要素

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电商、外卖、网约车、在线文娱等新型消费模式，其最深刻的革命性在于，它们在服务过程中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生成了海量的、动态的、高价值的用户行为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已成为一种全新的、可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并驾齐驱的关键生产要素。对于企业而言，利用消费数据可以精准预测市场需求、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个性化生产；对于政府而言，则能通过分析人流、车流、消费热力图数据，实现精细化的城市治理和高效的公共服务配置。数据的“非竞争性”和“无限复制性”使其能够系统性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二、消费的生产性赋能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

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并非空中楼阁，其坚实地基恰蕴藏于亿万市民日常的消费活动之中。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通过消费行为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性能量，从六个维度共同塑造着城市的未来形态。

激发多元需求，点燃“创新”引擎。创新城市的活力源自持续涌现的新需求。当市民

开始追求更健康、更智能、更个性的产品与服务时，便直接倒逼建筑、家居、医疗、文娱等全产业链进行技术与模式创新。而这些创新的火花，往往迸发于咖啡馆、共享办公、城市书房等开放、共享的公共消费空间。这些“第三空间”通过促进思想的碰撞与知识的溢出，构成了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中活跃跃的细胞。

提升空间品质，铸就“宜居”之本。宜居是人民城市最直观的感受。这种感受直接源于城市“空间品质”的高低——即餐饮、文化、公园等生活设施的丰富度、便利性与质量。高品质的空间不仅能吸引并留住人才，更关键的是，发达的家政、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体系，能将市民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闲暇去创造和享受生活，从而极大提升城市的幸福感与吸引力。

引领绿色消费，塑造“美丽”之形。美丽城市的实现，与可持续的消费选择密不可分。当市民的消费偏好从“够用”转向“绿色、低碳、环保”，这股强大的需求侧力量便会精准引导市场资源向绿色产业配置。无论是选择节能家电、绿色建材，还是拥抱低碳出行，市民的每一次“用脚投票”，都在为减污、降碳、扩绿注入动力，从源头推动城市的绿色转型。

赋能风险感知，增强“韧性”屏障。韧性城市的核心在于风险的“事前预警”与快速响应。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智慧城市的技术赋能。通过在供水、燃气、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上部署传感器，并与消费活动产生的实时人流、车流、物流等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城市管理者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洞察潜在风险，从而极大增强城市抵御各类冲击的免疫力。

传承城市文脉，沉淀“文明”之魂。文明城市强调对历史文脉的保护与活用。独特的历史街区、文化地标和城市风貌，本身就是空间品质中最稀缺、最宝贵的资产。通过将文化遗产融入现代消费场景，如在历史建筑中开设博物馆、书店、特色餐饮，不仅能激活其经济价值，更能塑造城市的独特魅力与品牌，让市民在消费中感知历史、建立文化认同，这正是城市精神归属的源泉。

驱动数字服务，奠定“智慧”基石。智慧城市的运行，建立在无处不在的新型数字服务之上。外卖、网约车、在线教育等平台不仅让城市生活更便捷，其在服务过程中生成的海量消费数据，本身已成为与土地、资本并行的核心生产要素。企业可利用这些数据优化供给，政府则能借此实现一网统管，提升治理效能。因此，一个活跃的数字消费生态，为城市“智慧化”注入了最鲜活燃料。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

新论